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古人炼丹服药那些事儿



寻找长生不老药,或者炼制仙丹灵药,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可谓源远流长。今天,咱们就说说古人炼丹服药的那些事儿。

一

1620年,明光宗朱常洛病了。离他登基当上皇帝,不过十天。

太医们束手无策。只有一个掌管御药房的内侍崔文升,给皇帝开了个方子。朱常洛也真是豁出去了,竟然敢照着这个方子配药、吃药。这下可好,大泻不止,皇帝虚脱到一度昏迷不醒。

然后,又有个叫李可灼的人来献药。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,举止颇有几分仙风道骨。他向朱常洛进献了自己调制的"仙丹"。朱常洛迫不及待服下一颗,感觉精神顿好。大臣们悬着的心也都放下来。

朱常洛直夸李可灼是"忠臣"。当晚,又服下了第二颗红丸。不过到第二天凌晨,朱常洛的病情突然恶化,随后一命呜呼。

李可灼及其进献的红丸,成了最大的嫌疑。是意外,还是蓄意?背后,有没有主谋?"红丸案"成为一桩众说纷纭的疑案。

二

服食仙丹,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。历史上服食仙丹的皇帝或名人,大多不是为了治病,而是为了长生不老,或为了升仙。

从秦始皇开始,皇帝们拉开了寻找长生不死药的序幕。秦始皇曾派出童男童女各五百人入海寻药。结果,都有去无回。

汉武帝晚年也怕死,这时候有方士声称可以炼制丹药。

方士李少君向汉武帝表示,他有一项神奇的技能,可以化丹砂为黄金,再用这些黄金涂抹餐具表面。一日三餐使用这种特制的餐具,可以延年益寿。

李少君深得汉武帝信任。不过,他还没帮汉武帝实现长生大业,自己就先病死了。延年益寿的说服力大打折扣。

现在的研究认为,李少君其实就掌握了一项核心技术:朱砂为溃(gǒng,同"汞")。就是他能够用丹砂烧炼成汞(水银)。汉武帝时代,估计有少数像李少君这样的"精英"掌握了这项技术。

秦汉之际,丹砂的需求量和价格都很可观。而其主要流向,正是用于炼丹。

古代方士把炼丹渲染得神乎其神,说白了都是围绕丹砂——水银之间的神奇"还丹"变化来进行的。

炼丹家在理论认知上非常淳朴。他们发现丹砂非常奇妙,能在水银、丹砂之间变来变去,不像草木一烧就成了灰烬。丹砂不但烧而不烬,而且"烧之愈久,变化愈妙"。

炼丹家们有一种朴素的信念,"烧不死"和"不败朽"的东西,一定也能使人长生不死。基于这种信念,炼丹家们不断折腾,在主料丹砂和水银之外,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其他金石药物,彼此混合烧炼,反复进行还原和氧化反应实验。

《黄帝九鼎神丹经》记载有九种神丹,依次为丹华、神符、神丹、还丹、饵丹、炼丹、柔丹、伏丹、寒丹,合成"九鼎神丹"。

三

炼丹家应邀为皇帝、贵族炼丹,一般都要先自服,试吃看有没有问题。

《洞仙传》写过一个故事,东汉时期,毛伯道、刘道恭、谢稚坚、张兆期四人一起在王屋山学道,学了三十多年,共同炼出一款神丹。毛伯道先试吃,死了。刘道恭接着吃,又死了。谢稚坚、张兆期一看势头不对,都不敢吃,弃药而逃。可见,以身试药,中毒风险太大了。

丹药中所含的铅、汞、硫、砷等物质对全身各系统和器官均有毒性作用。其基本病理过程涉及神经、造血、泌尿、心血管、生殖等多个系统。

为皇帝炼丹的方士,为了自身安全,会想方设法转移试药风险。

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当政期间,有个叫董谧的人向拓跋珪进献炼丹成仙的经书,获得重用。拓跋珪专门为他设置仙人博士职位,设立仙坊,作为煮炼仙丹的指定场所,还封了整座西山。最重要的是,拓跋珪为董谧提供了一批死刑犯,用于试药。

这批死刑犯,基本都试药试死了。拓跋珪自然也不敢服用董谧炼出来的仙丹。

知道服用丹药中毒的风险太大,惜命的皇帝通常不会轻易吃。北齐文宣帝高洋请方士炼成了九转金丹,但他一直放在玉匣里不吃,对外声称:"我贪人间作乐,不能飞上天,待临死时服耳。"

不过,唐朝人对丹药的态度,就没有这么慎重了。唐朝至少有五任皇帝与服用丹药中毒相关。

皇帝的疯狂,也带动了文臣武将、诗人道士的疯狂。李白、韩愈、元稹等,都极度热衷炼丹。整个大唐的气质,似乎都带着这种癫狂、迷幻而不真实的色彩。

入宋以后,服食金丹这种高风险的事儿,大家干得少了,慢慢转而练起内丹术。大家认为还是气功安全点。

到了元明以后,炼丹术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革,以丹砂、金石炼丹的传统方式,几乎完全被本草所替代。方士们希望在植物王国寻得合适的炼丹原料,即现今广泛流行的本草中药。

但并不是说本草丹药就无毒,很多用于炼丹的草木本身也有毒性。嘉靖、雍正等明清两代热衷于丹药的皇帝,时常服用的仙药可能主要是为了壮阳。这些仙药基本混杂了草本与金石,还有红铅、秋石、人乳等诡异的配方。有种说法,他们最终都中丹毒而死。

吴润凯 来源:《齐鲁晚报》

阎立本笔下的大唐"名场面"

今天我们将从一幅古画,窥探公元七世纪的长安,看看历史上有名的繁荣治世"贞观之治"。

这幅画叫《步辇图》,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,我们看到的是宋代摹本。画中这个被九名宫女簇拥而出,坐在辇车上的中年男子,叫李世民。这一年是贞观十四年,也就是公元640年。

此次一次性来了五个求亲使团,其中,西南雪域高原上的吐蕃使团,是松赞干布一方,已经是第三次来求亲,并且这次派出了他们的大相禄东赞作为使者。前不久,唐朝对吐蕃取得军事上的胜利。《步辇图》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。

这是一张设色绢画,画幅宽度为38.5厘米,总长129.6厘米,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面左侧有三个站立者,中间的那位便是吐蕃大相,使团正使禄东赞。和亲只有一个名额,却来了五个求亲使团,唐太宗很是为难。最后,唐朝方面想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办法:请五位大使参加考试,谁考胜了,就把公主嫁给谁家的君主。当时出了五道难题,吐蕃使臣禄东赞过关斩将,拔得头筹。

唐太宗非常高兴,决定将文成公主嫁予吐蕃王松赞干布。

一般来说,一朝皇帝接见使臣,应该在大殿或正式的官方场合。但在《步辇图》中,唐太宗不仅没有在正式场合接见使臣,也没有乘坐天子正式出行应该乘坐的辂,而是乘坐了步辇,而且比最小规格的八人抬步辇还要少两人,而仪仗队伍看起来也很是松弛。

唐太宗更是身穿便服,头戴幞头帽,坐姿很随意,这一切看起来,更像是唐太宗在宫中日常行走时与吐蕃使者来了个"偶遇"。

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目前学者们有两种看法。

一种看法认为,这是画家阎立本主观的处理,也许是基于画面的需要,因为完全还原一个盛大的外交现场画面会过于繁琐,所以,这也许是官至宰相的阎立本基于自己的政治深意,在画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

基于这些主观因素,阎立本将使臣禄东赞及其他官员的形象,和唐太宗李世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象以一种"拼合"的方法放入了同一幅画中。

另一种看法则相反,认为这幅是对禄东赞面见唐太宗原场景相对客观现实的再现,例如南京艺术学院艺术文献学博士王冠对此就有专门的研究,她认为这种看似不合礼的安排实则有着深刻的礼仪表达。

《步辇图》中的接见方式,从一场外交行为变成一次略带随意的宫中行为,是因为这种不拘常礼的方式,家庭式的随意氛围,有助于消弭此前的敌对与紧张。唐太宗,以亲人之姿接纳了吐蕃的提亲请求,促成了汉藏一家的太平盛景。

李正乔 羽羽

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